

王步贵 著

神秘文化



神秘文化

讖緯文化新探

王步貴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一、引言

文化是社会和人类主体性的精神表现。宗教与文化又有着很深的渊源。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也就开始有了文化。而文化又分为世俗文化与宗教文化。世俗文化是伴随人类的产生而出现的，宗教文化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才产生的。宗教与人类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大约从人类发展的新人阶段出现宗教开始，迄今为止的人类文化，许多与宗教联系在一起，从而使这块园地呈现出斑驳陆离的色彩。

我们这本小册子所要研究的是“谶纬文化”现象，它是界乎于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之间，尽管它的宗教神学色彩很浓，但仍不能算是宗教文化，因为谶纬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宗教。那么，这种“谶纬文化”到底是一种什么文化现象呢？我们以为，将它称之为“神秘文化”，倒是十分贴切的。当然，不论叫“神秘文化”也罢，还是叫“谶纬文化”也罢，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没有区别，都是一种文化现象，都有其特定的内容。

我们祖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文化的发展源远流长，丰富多采，内容极其广泛，形式也多样复杂。先秦时期的东夷文化、羌戎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岭南文化等等，都说明了我国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随着汉民族在秦汉时期的逐渐形成，一个庞大而统一的华夏文化

也应运而生。在这些被融合的地方性文化中，尤以羌戎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的巫风、神话比较突出。因此，我国的原始文化，乃至秦汉文化，都深深地留下了宗教的痕迹。东汉末年道教的产生，两汉之际佛教的传入，都使得汉武帝以来定于一尊的儒家文化得到了补充。

两汉之际的谶纬神学泛滥，也绝非偶然事件，远远不是什么小小插曲，而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大舞台上，由统治阶级导演的一出大型“威武雄壮”的神学闹剧。只是由于谶纬神学和统治阶级的利益贴得太紧，因而就成了统治者亦裸裸的争权夺利的工具，缺乏应有的社会基础，故而最终未能成为真正的宗教。但谶纬神学确曾起过宗教作用，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两汉之际的统治者曾经提倡、庇护、利用过谶纬；它也曾红极一时，登峰造极；围绕谶纬的论著虽非汗牛充栋，却也是十分浩繁而驳杂；况且从谶纬兴起、泛滥，直至衰微，前后经历了数百年之久。就从这些方面而论，我们把谶纬神学作为一种“神秘文化”来研究探讨，对了解两汉思想演变和矛盾，将不无意义。

在中国文化史上，除了“殷民尊神，率民事神”（《礼记·表记》），宗教文化曾经一度在殷代占居统治地位，其他任何时期的宗教文化都几乎没有支配过其他文化的地位。就是最高封建统治者宣布道教为上的唐初，宗教文化也没有这样的作用。在我国，没有任何一种宗教能够成为国教，只有非宗教的儒家文化从汉武帝以后一直居于首领的地位。倒是有这样一种情况：不论是土生土长的道教，还是外来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或者是我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宗教，他们在其发展过程中，都曾不同程度地出现过附儒的事实和倾向。同时，儒家文化也不排斥宗教文化中有益因素，而是不断吸收其他一切有益的文化来丰富自己。因此，在我国，不了解宗教文化，甚至包括象谶纬文化这种宗教色彩很

浓的神秘文化，便无从了解世俗文化。只有懂得了我国的宗教文化，才能更好地了解我国的传统文化。鲁迅先生说得好：“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尽管鲁迅先生谈的只是道教，但是，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宗教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正因为我国传统文化不拒绝涓涓细流，善于融合与吸收，因而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和积极因素。诸如变易变革思想；自强不息、刚健有为、好学不倦、“天地之大德曰生”的人生哲学；孔子提倡的发愤忘食、乐而忘忧，反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孟子提倡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情操；范仲淹提倡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品德；顾炎武宣扬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以及代代相传的“民惟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及“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刻苦耐劳、坚韧不拔的愚公移山精神；重人际轻鬼神的唯物主义精神，还有近代以来吸收的民主和科学思想等等。

当然，传统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宗教文化的过程中，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因而在其溶合消化中，会反映出固有的外来的许多守旧落后的东西和封建性的糟粕。诸如“别尊卑、明贵贱”的等级观念；“天不变、道亦不变”、“天人感应”等唯心论哲学；“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伦理道德；重人治轻法治及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特权思想等等。这些消极的东西，都是阻碍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的东西，理应清理。

讷纬产生于汉代，这并不能说明汉代思想的贫乏，恰恰相反，汉代在思想方面的建树是多方面的，可谓博大而精深。正如汉人在事功上的阔大进取一样，在精神上、哲学上，汉人也是阔大而宏富的。“独尊儒术”，既代表一种思想和学术的指导方针，又代表一种新的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从此以后，经学迅猛发展，

“明经之士”在社会和政治上的力量急剧扩张，成了地主阶级的骨干力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一直影响和支配着汉代政权和政治的命运。

石渠阁会议的结果，出现了政教合一的局面，经学的地位虽然达到了顶点，而同时又使它成了政治的附庸。在哀平之际，迅速蜕化为讖纬这种粗俗、荒诞的赤裸裸的神学。这样，到了东汉初年，思想学术领域的形势，便成了讖纬、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三足鼎立的局面，而古文经学有日益得势的趋向。白虎观会议，汉章帝亲自出席，意欲以最高权威的身份，平息三家鼎足的矛盾，但是，恰恰相反，正是这次会议，标志着经学的没落，而讖纬却与神仙方术及社会救世因素相结合，孕育了《太平经》（参阅汤用彤《往日杂稿·读〈太平经〉所见》，载《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之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黄老则变为道教而为统治者所提倡和农民所崇敬。

从中可以看出，讖纬及其文化现象曾为道教的产生和创立，提供过舆论准备、思想因素和理论素材。可见，讖纬文化确有探讨之必要和挖掘之内容。

汉人对宗教的态度，看来是有感情的。汉明帝求法，白马驮经的故事，脍炙人口，久传不衰，则是有力的证明。然而，这并不是说，有了皇帝的青睐和支持，佛教的传入就是一帆风顺的。事实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它和中国固有的宗教迷信、王权思想、儒家和道家学说，存在着分歧、矛盾、冲突、斗争。为了生存，落地生根，佛教采取了调和的立场，入乡随俗地依附于道士、方士，以求“安身立命”。在秦汉之际，中国盛行神仙方术。秦皇汉武都笃信不死之药可求，神仙可致，大有实现肉体飞升的希望。这种宗教迷信的社会影响十分广泛、深远。

佛教初传，佛被中国人视为和中国传统迷信的天帝、神仙一

般，佛教被认为不过是九十六种道术之一，是求神祈福的祠祀。佛教禅学的一套修行功夫，也被认为是和道家的“食气”、“导气”、“守一”等养生养神的长生不死的方术相通，而依附于黄老道学和神仙方术获得传播。佛教为了在中国立足，扩大影响，不遗余力地寻求赖以生存的土壤。一些前来传教的外国僧人都重视学习中国的方伎信仰和讖纬迷信，作为传教的方便手法，如佛经汉译的创始人安世高“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高僧传》卷一《安清传》），昙柯迦罗“风云星宿，图讖运变，莫不该综”（同上书《昙柯迦罗传》）。这都是佛教争取中国群众信仰之所必需。

由此看来，讖纬在佛教传入和立足的过程中，曾起过媒介作用。

讖纬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兴起于西汉哀、平之世，而盛行于东汉，完全是政治危机所造成的结果。从它的思想实质看，虽然继承了董仲舒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但就其表现形式的荒诞怪异以及脱离经典编造神的旨意的作法而言，则又与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官方正统神学经学不尽相同。讖是“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的宗教预言。这是一种古老的预言迷信，在历史上早就产生了，在先秦的记载中，多有所见。纬对经而言，是用神学来解释经义并把这种解释托之于孔子的书。纬只有把儒家经典奉为神圣以后才能出现，比讖要晚得多。这样看来，一早一晚，二者原非一类。

但是，当二者结合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思潮时，讖纬合流，难解难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实就都成了一回事，这就是讖纬的演变过程。正统的神学经学主要是适应和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的需要而产生的，那么讖纬则完全是社会危机的产物，它反映了统治集团企图挽救危机的努力和挣扎。在社会和政治危机的年代，统治集团内部起了分化，各派政治力量相互斗争，都要援引经义，

把自己实际的政治利益转化为虚幻的上帝和孔子的旨意，讖纬正好能起到这种作用，因而风靡一时，登上宝座，充当“国宪”，钦定是非，俨然以“太上皇”自居。但当危机一过去，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的要求，提上了议事日程，讖纬那种不安定的破坏性因素就会显露出来，这当然又不为希图“天下大治”的统治者所允，所以，讖纬始终不能代替正统的神学经学地位而上升为长期的统治思想，也由于它的种种弊端和“先天不足”条件，也始终未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宗教。

讖纬从它的产生、形成、地位、作用等方面来看，都罩上了一层薄厚不等的神秘色彩。它宣扬神学，想成为宗教，但它的更多更大的兴趣，又不在彼岸，而在现实社会，不在上帝那里，而在皇帝那里；讖纬以纬解经，神化儒家经典，但内容庞杂，颇多矛盾，不仅有灾异感应，讖语符命，神仙方术，神话幻想，驱鬼镇邪，而且还有天文地理，风土人情，自然知识，文字训诂，哲经文史；不仅有关于神学内容的矛盾，而且还包含着有神论和无神论的矛盾，正统经学维护伦理纲常、追求社会进步与野心分子搅乱政治、制造社会混乱的矛盾；不仅是一种眼光卑下、心灵污浊，拙劣的欺骗和愚弄，而且讖纬的象数思想又包含有宇宙和谐的天才的猜测。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讖纬既有其神秘性，又是一种影响了社会各个领域和层面的文化现象。从这种角度出发，我们把讖纬作为一种“神秘文化”来挖掘解剖，不仅有思想史的意义，而且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二、导 论

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巨大影响和作用于一 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显然，这种释义从原则上讲是对的。

然而，当我们将审视的目光转移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极为光辉灿烂的、也是中国文化的定型期的两汉，就不难发现，这个定型期的形成是以趋善求治为特征的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

两汉，特别是在它的前期，是我国历史上的英雄时代。承前启后，结束纷争，开拓进取，一展宏图，以一个疆域辽阔、幅员广大、人才辈出、文化繁荣、思想解放、学术恢宏、人口众多的封建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屹立于世界东方。汉代的哲学、文学、美学、绘画，充分地反映出天人合一、人神难分的壮阔场景。在汉人的思想境界中，人是天地的产物，但它与天地是并驾齐驱的，且“天地之所贵者人也”(王符语)。人“下长万物，上参天地”，具有伟大的力量。正象王符在《潜夫论·本训》篇中所指出的那样：“人之动天地，譬如车上御驰马，蓬中擢舟船矣。

虽为所覆载，然亦在我何所之可。孔子曰：‘时乘六龙以御天。’‘言行君子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从此观之，天呈其兆，人序其助，《书》故曰：‘天工人其代之。’王符在《潜夫论》中，反复咏叹的“天工人其代之”，可以说，正是汉人哲学的根本精神的体现。“作为一种客观的力量和规律，与人对立的‘天工’，其使命正是由人代表和完成的。‘天工’唯有通过人才是现实的，因而现实的一切，包括社会的文明、文化和人化了的自然在内，无不是人的产物，无不打上人的强有力的印记！”^①

两汉文化，极富哲理，模式阔大，气魄雄浑，上承前，下启后，丰富多姿，异采纷呈，殊途同归，博大精深，“以致即便在讖纬中，它仍然是被新奇地想像的对象。有如现代科学幻想小说一样，讖纬对人的形体、气质、功能作了多样性的描绘。如‘奇肱氏能为飞车，从风远行。汤时西风吹，奇肱车至于豫州，汤破其车，不以示民。十年西风至，乃复使作车遣归，去玉门四万里’，等等。”^②

可见，讖纬文化在两汉的文化形态中，是占有一席之地的。现在，让我们首先回顾一下两汉文化（当然也包括讖纬文化在内）的特质和共性。

众所周知，两汉文化，基本上是定型的，成熟的，而这种定型、成熟的基本要求和标志具体表现为：社会制度的创建和确立；价值系统的定位；文化模式的确立；文化大传统的形成。

那么，这种认识的理论前提又是什么呢？大多数研究文化学的专家普遍认为，从宏观的角度分析，文化起码涵盖有三个不同层次的因素：即物的因素，处于文化的表层；心物合二而一的因素，这是文化的中层，包含有诸种制度与理论体系，以及潜藏在物质这个表层里的人的思想、感情、意志等；文化的深层，要深

^{①②} 金春峰：《汉代思想史》，第7、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奥复杂得多，其中哲学是核心。这个层次，涉及到审美情趣、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思维方式、宗教信仰，以及民族性格等。这个深层次的对应部分是心的因素。

就这三个因素所对应的三个部分而言，文化的物质层最为活跃；而制度、理论层最为权威；心理因素的层面最保守，它是文化赖以成为类型的灵魂，起核心作用。

从战国中期到西汉中期，中国社会经历了由军事统一到政治统一，再到思想统一的曲折历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方针，从而确立了以儒为主、统合诸家的思想体制。这种思想体制正是思想统一的最后完成。有了这种完成，才产生了两汉文化的宏富气象，而这种宏富的文化现象，又具体地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经济的大繁荣。汉代经济繁荣的主要标志之一，便是谷物种植业的发达。禾、黍、稻、麦、菽、麻等作物，已成为主要农作物，而尤以麦和稻的种植最为广泛，因而在人们的膳食结构中的地位也日渐重要。随着农作物的精耕细作，单位面积的产量因而有很大的提高，伴随而来的是生产工具的改进，先进种植技术的推广，这一切都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作为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基础，因而便奠定和确立。

促进汉代经济繁荣局面形成的第二个因素，便是手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据《盐铁论·复古》记载，地方豪强的私营手工工场，常常“一家聚众千余人”。这说明手工业工场不仅数量多，规模也大。

汉代手工业发达的另一个典型表现，便是纺织业的空前兴盛。二十世纪70年代，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中，发现的帛书《周易》和《老子》，特别是作工精巧、轰动中外的帛画，便是有力的实物证明。汉代的制盐、冶铁、漆器制造等，都相当发

达，而且对后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汉代商业的高度发达，也是汉代经济繁荣的柱石之一。尽管有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的干扰，但商业受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所促使，仍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欣欣向荣的局面和景象。“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种“熙熙攘攘”，正好反映了商业的兴旺发达，致使富商大贾周流天下，物资交流得以畅通。

概括而论，汉代经济繁荣的链条，就是由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这三个重要环节镶嵌和谐而滚动向前的。

二、科学技术的空前发达。这是一个科学技术上极为辉煌的时期。农业上出现了耒车、风车、水碓、代田法、区种法，等等，这些新工具和新方法的推广运用，增强了人们战胜自然的能力，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九章算术》奠定了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汉武帝时颁布的《太初历》标志着中国古代天文学体系的形成。这个历法第一次把二十四节气包括了进去，从而方便了农业生产，因而一直沿用至今。《汉书·地理志》开创了我国以疆域地理志为特点的古地理学体系。《黄帝内经》成书于西汉，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医学理论著作，为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还有药理学著作《神农本草经》，也成书于汉代。造纸术的发明，以及蔡伦对它的改进、革新，都是汉代的科学技术成就。

三、学术教育事业的繁荣昌盛。汉代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和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二者都是开创性的史学硕果。汉代文学的成就是以辞赋为标志的，它是一种长篇巨制的韵文，“包括宇宙，总揽人物”，是汉代大一统政治的鼎盛气象的表征。汉代文论提倡“温柔敦厚”，以儒学为宗，在理论上大踏步地向前跨进，为中国古代文论的思想准则，构筑了

它的基本理论框架。汉王朝为了实施教化，统一思想，稳定政治，逐步建立了中央和地方的学校制度，为以后的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学校制度提供了样本。与官学的发达相适应，汉代的私学也十分昌盛活跃。许多仁人志士，学者大家，都是在治学严谨、探讨自由、学术空气相对浓烈的私学中培养造就出来的。汉代文化繁荣的另一个侧面，便是哲学的高度发展。陆贾、贾谊、《礼记》、《淮南子》、司马迁、董仲舒、扬雄、纬书、《白虎通》、王充、王符、仲长统，以及道家思想的演变和道教的产生，等等，等等，都彪炳史册。这些人物，这些著作，都是具有理论开拓性的、体系创建型的重大贡献。他们都适应了社会政治的需要，推动了哲学车轮的前进。

谶纬文化产生在这样一个广阔背景、时代氛围、“膏腴沃土”之中，应该说，它的“先天”是充足而充实的。

或许会有人说，谶纬是汉代流行的宗教迷信，是一种虚幻的神秘主义，是今文经学和汉代神学迷信相结合而孕育的一个怪胎，本身毫无价值，应该作为思想垃圾予以屏弃。我们认为，谶纬虽系“怪胎”，但却具“人形”；虽系神秘主义，但隐藏着科学因素和哲理成分，世界各民族大抵如此。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古今中外的诸多学者在探求科学起源的奥秘时，都意外地发现，这种起源竟羞羞答答地隐蔽于浓厚的神秘主义的迷雾之中；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认为：万物有灵，是理性的最初骚动。他坚信不移，“万物有灵”是古老而野蛮的原始人从观察理解和逻辑推理上发生发展而来的，是简单的认识论和自然哲学，是低级文化的形式特质。泰勒是一位进化论者，在他看来，人类文化是从低级形式发展到高级形式的连续系列，是呈螺旋式的上升趋势。他指出：“野蛮人的生活（继续留存于当代的石器时代的生活）可以正当地称之为人类远

古状态的样本，不仅物质生活方面如此，而且在理智生活和道德生活方面也是如此。”人们只要留心去把握未开化民族宗教的一般原理，就不会有人仍然认为它是愚蠢可笑的，或者把它视为对别的民族是多余之物。它的信仰和实践远不是各种愚蠢行为的垃圾堆，它们从其开始之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前后一贯的、合乎逻辑的，即使我们只对它们粗略地进行分门别类，也可以证明这类原理本质是合乎理性的，尽管这些原理是在强烈的、根深蒂固的无知这种心理条件下起作用的。”由此看来，泰勒不仅认为万物有灵是“石器时代的宗教”，而且还认为，原始宗教的观念和信仰实践，蕴含有理性的因素。古代神灵之说的传统观念，实乃是人类野蛮时代的思想反映，理性觉醒，认识论的发生，充分地体现了思想史上前逻辑时代人类的心理意识。

当历史的车轮正在朝着二十一世纪的时空境域奔驰时，万物有灵的观念的确是荒谬无稽、幼稚可笑的，但在人类的童年史上，却有着振聋发聩、石破天惊的反响。在原始人的思维模式中，神灵世界和世俗世界，可见世界与不可见世界的并行交错组成的图景，大大地拓展了原始人的视野，致使童年的人类有可能立足可见世界经过图腾崇拜和巫术仪式去进一步窥测不可见世界的奥秘。尽管这两个世界的划分在原始人的心目中，仍然是模糊的，感受的或想象的，但作为一个起点，一个开始，这种划分无疑为人类进一步在自觉的哲学认识基础上，通过理性的思辨，达到对世界的科学认识奠定了基础，树立了里程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原始人“试图由现象求本质、由现象求现象所依赖的基质，表明他们身上已萌发和迅速地发展着一些新的精神，这就是形而上学的、科学的探索精神。”^①这种精神恰恰孕育着人类最初、也是最壮丽的文明之树上的花蕾。

^① 参阅高新民《人自身的宇宙之谜》。

泰勒“万物有灵”的更精采之处，在于他认定正是蕴含于“万物有灵论”中的理性因素，象一种有效的催化剂一样，催发了人类原始科学的嫩芽。对此，陈昌曙先生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与认识论》中，也有同样的精辟论述：“原始宗教观念是虚幻的，它却不同于蓄意的伪造和毫无事物根据的谎言；原始宗教也起着使人畏惧神灵给人以慰藉的作用，它的目的却不是要用来世的幸福去麻醉人们的意志。原始宗教观念是原始人对自然现象和人的行为难以理解的一种理解，难以讲出道理的一种道理。在原始宗教的自然观中，包括着某些合理的因素。原始宗教是当时自然知识不足的表现，又是一种特殊的自然知识，因而也是那时的萌芽状态的科学的补充。”

由此可见，要寻找原始科学理论的萌芽和翠绿，还只有到原始宗教的信仰和实践中去，那里有童年人类早期的观念系统，其中隐含有丰富的原始科学思想。泰勒先生就是在这里找到了科学起源以至于某些哲理最隐蔽的一角。

我们在这里所指的“科学”，当然不是原始人早期工艺技术方面的知识，如石器加工、取火、制陶等方面的实践活动，而是指观念形态上的知识。诚然，在原始人早期的自然观中，谬误多于真理，愚昧多于科学，错误多于正确，必然多于自由，但毕竟是人类最初也最早试图用观念形态反映自然的过程，是人类第一次试图用抽象思维、逻辑推理来概括自己的宇宙观，这种已超越了实践的活动过程而上升为理念的把握，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它的意义不在于这种把握确认了多少真理或多少科学因素，而在于表明，理性的幼芽已在人类寂静的精神沙漠中，开始露出了头。

灵魂观念产生之后，原始人的思维、生活、实践、视野是极大地扩张了。但史前时代的人类对自然界的驾驭能力仍然是十分有限的，那些包围他们的、恐吓他们的、给他们带来痛苦不幸甚

至死亡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象一块大石头一样，沉重地压迫着他们的身心，因而知识的或技术的有限认识远远让位于对神秘自然力量的信仰和崇拜。对此，原始人只能借助于巫术祈求于神明来加以保护，从而得到精神上的某种安慰。

然而，巫术并不完全是原始人无力抗争的精神寄托，而是一种特殊的、企望对不可知世界进行控制的一种手段。马林诺夫斯基在其《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中进行认真研究之后认为，许多尚未开化的部落的巫术，蕴含于简单的巫术仪式并出现在一切巫术施行过程之中的是一种共同的巫力，这种巫力是巫术中最重要东西，它是原始人试图与神秘之力分庭抗礼的力量源泉。原始人正是通过施术把巫力释放出去，惩恶扬善，改变逆境，以利生存。当然，祈求神明，借助巫力，企图以达到控制自然的目的是虚幻的、不切实际的、因而也是无效的，但与其简单地否认巫术是愚昧的产物，倒不如说它是人类认识、征服自然的天性，是人类炽热的创造欲望和参与冲动，是人类自我觉醒的先声，是人类寻求力量对象化的最初也是最迈劲的努力。

马利诺夫斯基还认为：“巫术与科学站在一起的地方，乃在有一个清楚的目的，深切地与人类本能、需求、事务等相联络。巫术是用来达到实用目的的。它与旁的技能一样，也受理论的支配，也有一套原则来指使它怎样进行，以便达到目的。……科学与巫术都发展一套特殊的技术……所以巫术与科学有几种相似之点”。这是他在考察了梅兰内西亚的巫术以及巫术施行的种种禁忌、律令、仪式之后得出的结论。

其实，马林诺夫斯基的老师、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弗雷泽，早就对巫术的合理内核有所揭示。他在自己12卷本的巨著《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中，详尽辨析了大洋洲，尤其是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大量宗教活动，探讨了巫术、禁忌、图腾等原始宗

教现象，得出许多精辟掷地作金石声的见解，因而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弗雷泽把人类理智的发展概括为：巫术——宗教——科学三个阶段，而且坚信，巫术与宗教对立而与科学相容。就是说，巫术与科学都认为世界存在着一个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在思维结构上是同构的、相容的。他指出：“巫术与科学在认识世界概念上，两者是相近的，二者都认定事件的演替是完全有规律的和肯定的。并且由于这些演变是由不变的规律所决定的，所以它们是可以准确地预见和推算出来的。一切不定的、偶然的和意外的因素均被排除在自然进程以外。对那些深知事物的起因、并能接触到这部庞大复杂的宇宙自然机器运转奥秘的发条的人来说，巫术与科学这二者似乎都为他开辟了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前景。于是，巫术同科学一样都在人们的头脑中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强有力地刺激着对于知识的追求，它们用对于未来的无限美好的憧憬，去引诱那疲倦了的探索者、困乏了的追求者，让他穿越对当今现实感到失望的荒野。巫术与科学将他带到极高极高的山峰之巅，在那里，越过他脚下的滚滚浓雾和层层乌云，可以看到天国之都的美景，它虽然遥远，但却沐浴在理想的光辉之中，放射着超凡的灿烂光华！”弗雷泽虽然认为巫术与科学在思维结构上是同构的，在“对某种由客观规律决定的事件程序的一般假定”上是同一的，但弗雷泽作为一个充满理性的现代学者，当然不会因此就认为巫术即是科学。对此，弗雷泽也有分析。他指出，不论是模拟巫术或接触巫术，都是原始人对“相似联想”和“接触联想”这两大思维规律误用的结果。运用得法就可能结出科学的果实，否则，将只能产生出科学的假姐妹——巫术。因此，“伪科学”或“科学的近亲”，总是弗雷泽对巫术的代称或别名。他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前进，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们认识和控制、征服自然的能力得到加强，巫术或迟或早